

安格爾娜白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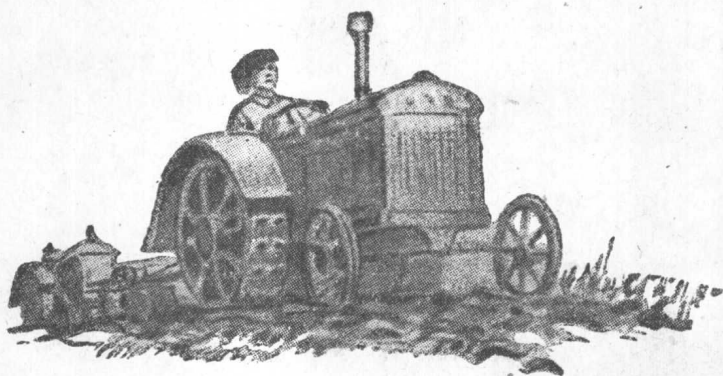
譯 奇 何
校 生 樹 于



K835

4

青年出版社印行



傳白娜林格安

羅奇 何
陵生 樹子

行印社版生年青

PRASKOVYA ANGELINA
MY ANSWER
TO AN
AMERICAN QUESTIONNAIRE
莫斯科外國文書籍出版局出版



安 格 林 娜 自 傳

著 者：P · 安 格 林 娜

譯 者：何 奇

校 者：于 樹 生

出版者：青 年 出 版 社
發行

總管理處：北 京 東 單 二 條 三 四 號

營 業 處：北 京 上 海 西 安 重 慶 廣 州
瀋 陽 漢 口 太 原 濟 南 福 州
無 錫 杭 州 蘭 州

印刷者：青 年 印 刷 廠
北 京 鐵 獅 子 胡 同 十 二 號



1951年8月初版

1 — 15,000 (京)

定價人民幣2,900元

我接到一封從美國寄來的信；一位當教員的朋友替我譯了出來。這封信裏說紐約百老匯二九六號一個機構將要出版一部『世界名人傳記全書』，包羅各國有名人物的傳記。

這封信附帶解釋到所謂『名人』是什麼意思；他們是：第一，聯合國的領導人物，其次，原子彈的創造人，在這些人的後面才輪到其他科學、藝術、文學以及實業界的工作者。

在一張上端以一幅展開的世界地圖作背景畫着厚厚一冊書的信紙上，編者告訴我說普萊斯可美亞·安格林娜（Praskovya Angelina）代表的名字已經被列入世界名人傳記全書，同時要求我填寄附表所提的一些問題。

在普通的問題（姓、名、出生日期與地點等等）以外，來信要求我列出一張『從妳的事業開始到現在』我所做過的職業清單，詳細說明職位名稱和勳章、工作地點、住址、我的父母與子女的名字和職業、軍事榮譽、著作，以及許多其他的項目。

這是我的回答：

「安格林娜，普萊斯可芙亞·尼基婦奇娜。一九一二年出生。出生地點（也是工作地點與住址）：烏克蘭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斯大林州斯大諾·拜雪弗（Stano Bychevo）村。父親：安格林，尼基他·瓦西里維奇。集體農民，原先是農人。母親：安格林娜，葉妃米亞·費阿道羅夫拉。集體農民，原先是農人。「事業的開始」：一九二〇年和我父母一道在一個富農家裏當僱工。一九二一至一九二二年在阿力克色耶弗·瑞斯尼安斯卡亞煤礦當挑煤工人。從一九二三到一九二七年又回來種莊稼。一九二七年以後，在一個土地集體耕種的村社裏工作，管理牲口，這個村社後來成為列寧集體農莊。從一九三〇年到現在（其中一九三九至一九四〇兩年除外，當時我在莫斯科的第米利亞哲夫農業學院學習）是拖拉機手。我有三個孩子——斯越特勒拉、法魯里和斯大林娜。從一九三七年起我參加蘇聯共產黨（布爾什維克）為黨員。我又是土地局職工聯合會的會員。出版著作：除一九三八年在基輔出版的一本我的拖拉機隊小冊子以外，我曾經在報紙雜誌上發表過許多關於怎樣組織拖拉機隊的工作和其他農業問題的論文及演講，敘述了我自己的工作經驗並予以分析。至於軍事榮譽，我重視一個砲兵團隊的前線戰士所贈給我的「保衛者」的稱號，爲了在困難的戰時條件下，在後方勝利地完成了工作任務，那時我們的集體農莊曾經積極地支持着砲兵團隊。我已被選爲第四百七十四號阿爾夫洛希耶弗選區的蘇聯最高蘇維埃代表。榮譽稱號和獎章：社會主義勞動英雄、蘇聯農業展覽會金質獎章、兩個列寧勳章、勞動紅旗勳章，和

許多獎章……」。

來信所提的問題非常詳盡，甚至於要我填出像結婚日期這種項目，或者，如我母親的少女闖名之類。但是這一套詳細的問題並沒有包括那最重要的問題，就是，什麼樣的環境使我能够由一個本來沒有受過教育的農人成爲一個立法議員、一個最高蘇維埃的代表。

以前我會接到另一封從美國來的信，却會向我提出這個問題。那次的信是阿拿巴馬的一個名叫本亞明·馬頓的農民寄給我的。

關於他自己的情形他寫得非常簡單；他用了兩個字來表示「very bad」（很壞）。這兩個字不經翻譯我就了解是等於俄文的「byeda」意思是「困苦」、「不幸」。

馬頓並沒有想要知道我結婚日期的那種好奇心；他要知道在蘇聯一個人如何可能有像我這樣的一生經歷：農人、拖拉機手、「立法議員」。

我看到「亞美利加」和「不列顛聯邦」兩種雜誌。我認爲這些雜誌大部分都是些「粉飾和渲染」，表面上說得好聽，它們發表的東西與馬頓所抱怨的完全相反。但這不是現在要談的主題。

在那些外國雜誌裏面，我們時常讀到「驚人」事業、「特殊」傳記的描寫。

例如，我記得一個關於某紳士的生平的有趣的敘述：那本雜誌說，這位紳士是「人民中來的」。他以報販起家，後來變成了百萬富翁和許多報紙的主人，並且昇到貴族。

我自己想：那麼在那部名人傳記全書裏將有兩篇傳記並列：我的和那位勳爵*的（我的在字母『A』的下面他的在字母『B』的下面）。關於他書上將寫着：「姓、名、出生日期、結婚日期、父母都是貧民、起初是一個報販、後來成為貴族。」關於我將寫着：「姓、名、出生日期、結婚日期、父母都是貧民、起初是個農人、後來成為蘇聯最高蘇維埃代表。」

讀到這些，我的美國朋友本亞明·馬頓以及很多像他這樣的人將要問：「他們兩個人之間有什麼不同呢？」

是的，這問法是對的。除非你問「是什麼樣的環境？」你是不能了解和評價一個蘇聯公民的一生經歷的，因此，也就不能了解和評價我的經歷。主要的一點不在於我這個特殊的個人，……而在於我的向上發展並不是一個例外；我所提到的那位紳士是「從人民的行列中起來」，或正如那個雜誌所說是從「人民中來的」，後來他成為貴族，但是我是和人民一道起來的，和我的英雄的人民全體一道成了女英雄。這才是最重要的一點。

因此，我將要在世界名人傳記全書所提的範圍以外，並且不完全以高貴的編輯先生為對象把我自己作過多的描寫，而要對美國多數農民談談這一點最重要的事情。同時我也願意回答我們廣大聯盟各地的友愛的蘇聯公民在許多信裏向我所提出的問題：「您怎樣成為您現在這樣一個人的

*是指英國的比弗布魯克勳爵（Lord Beaverbrook）而言。

啊，帕莎？」

在蘇聯經過了三十年建設的今天來回顧我們走過的道路，回想我們國家的輝煌事業，是特別適當的；這個事業同時也就是我們每個人、她的人民的事業。我們的命運是這樣不可分地與我們的國家和黨的命運聯繫在一起，當一個人在回憶到自己的辛苦與成功、憂愁與快樂的時候，他會不知不覺地看到了比一己的個人的事業大出百倍的東西。

所有我們今天所享受的好東西、我們的一切知識、一切使我們富裕、強壯和快樂的東西，都是一個偉大因素——蘇維埃制度勝利的結果。

多年來我是一個拖拉機手。對於我還是比『僅僅一個職業』有更多的意義的。它是我在完成五年計劃的鬥爭中，在偉大的衛國戰爭中的工作崗位；它是我的幸福、成功和聲譽的源泉。……

對於我，也如同對於我們全蘇聯人民一樣，『拖拉機』這名詞不僅僅意味着『一個有內燃機的曳引機器』，還有更多的意義。拖拉機幫助我們改變了鄉村的整個生活；它掃除了小塊土地的界線，這些界線好比是土地的軀體上的傷痕一般；它引導了千百萬農民進入集體農莊的生活道路。……

拖拉機……我永遠不會忘記十三年前的那一天，當納得茲達·康士坦丁諾夫娜·克魯普斯卡亞在人民教育委員會接見了我們鄉村女孩子以後，帶我們到列寧陵墓去時的情形。

我們繞着列寧的靈柩走，屏着氣息，……當我們從陵寢出來進入了紅場的時候，納得茲達·康士坦丁諾夫娜輕輕地說道：

『他曾夢想俄國有十萬個拖拉機手。……』

一九三〇年春天，我第一次坐在一架拖拉機上的時候，我並不知道列寧的夢想，也不知道我們國家已經有了成萬的拖拉機手。在一九三〇年我們所有的六萬個拖拉機手裏面，我是唯一的女人，我是第一個拖拉機『女駕駛員』，但是，我自己却完全不知道。

我對斯大林和黨在我們鄉村裏所進行的巨大工作的認識，主要是憑我的熱情而不是憑我的智力。

這是在一九三〇年，我們集體農莊取得勝利的一年，它給鄉村生活帶來了重大的改變。這也是我們第一個五年計劃完成的高峯。

新的建設正在我們廣大的蘇聯到處進行着。在每一個地方你都一定會發現青年人站在建設者的前列。

在晚上，我們斯大諾·拜雪弗村的青年們聚集在俱樂部房間裏，在五年計劃的圖案前談論着我們國家的將來和我們自己的將來。兩者都現出光明的廣闊的遠景，而它們又是相互分不開的。

我們中間沒有人想到要袖手等待着將來；我們列寧共產主義青年團員是積極的一羣，絕不

甘願在我們本鄉的興旺生活中扮演最沒有意義的角色。

但是我有一個思想，覺得在我們的斯大諾·拜雪弗村以外，還有更困難更重要的事情在進行着。我想要到一個建設事業去做工，並決心要找到五年計劃中最急需的工作中的一種。我熱心地注意着『徵求工人』的廣告，這類廣告當時報紙上很多。

一時我想去遙遠的西伯利亞幫助建設庫茲涅茨克、未來的一個花園城市；一時我又想到聶泊河水開工程去。但是實際上並不需要跑得很遠很遠，因為我們的斯大諾·拜雪弗鄉村正在頓巴斯的中心，無論你朝那一個方向走去，你一定可以找到一個重要的建設事業，例如哥爾洛夫卡機器製造廠、克拉馬爾斯克機器製造廠、有名的洛齊恩可弗煤坑、或者阿佐夫斯塔耳鋼鐵工廠，所有這些當時都在建設過程中。

我的哥哥伊凡竭力想說服我，說五年計劃也正在我們的斯大諾·拜雪弗進行，但是我不相信並且時時刻刻想要離開。

有一天伊凡被派到別處去受更高的教育，他是我們本區的第一個拖拉機手和住宅區黨組織書記。我立即決定代替我哥哥做一個拖拉機手（『女拖拉機手』這名詞當時還沒有聽到過）。

起初每個人都笑我，但是因為地方當局沒有派人來代替我哥哥的位置，他的拖拉機空閒着，拖拉機站站長就同意我來試試。我的哥哥曾經教過我一些關於拖拉機引擎的知識，在經過一個短

時期的進一步訓練之後，我考試及格。站長對我說：

『好了，妳就担任這工作吧，但是妳要小心點……』

於是，在一個早晨，很早很早，我第一次駕拖拉機到田裏去。天氣很冷，冷得使我的兩頰發紅。我的拖拉機軋軋地前進着，我不斷回過頭來看我的第一次犁溝，它曲折地在犁頭上像一陣黑波浪，從那裏升起一道淡淡的蒸氣，……我要歌唱，要大聲地叫出來。……

我決定做一個拖拉機手，居然做成了。

『有志者事竟成』現在說來容易，但是在一九三〇年的春天那是非常困難的。當時對於工作我是費了多少氣力與眼淚啊！

但是，我並不是害怕困難，至於氣力一層，也沒有使我煩惱。那時我已經到了十八歲，並且已經是一個『老共產主義青年團團員』。那個時期的青年團員們是習慣於困難的；許多困難已被克服了，許多困難仍然擺在面前。……

到了一九三〇年，在我們國內的許多鄉村發生的事情也同樣在我們的斯大諾·拜雪弗村發生了。富農被打倒並被驅逐了。列寧集體農莊建立起來。這時已經消滅了界線的土地，都使用拖拉機來耕種。

所有這些都是艱苦奮鬥才得到的，新制度還很脆弱，像一個初生的嬰兒。

我記得我父親一半開玩笑一半也是實情地稱他自己走「家庭黨組織」的書記。他和我的哥哥瓦西里、尼可萊及伊凡都是共產黨員，而我的弟弟考斯第亞、我的妹妹妮阿里亞和我當時是列寧共產主義青年團的團員。我們和黨、青年團的組織一道，成爲組織集體農莊、檢舉並驅逐富農以及在本村村民中間進行政治教育活動的工作的急先鋒。

我們有這樣的一個家庭真是幸運！

從一九二七年起我們就有了一個辦理集體種田的農社。當時富農在本地的勢力仍然頑強。我們不過是剛剛開始學習怎樣處理事情。

農社不得使用富農的農具、牲口和收割機。

當把農作物的收成在農社的社員中間進行分配時，報酬不僅根據各人所做的工作，同時也依照農具、牲口以及機器的使用。

所以發生了這樣的現象：我們的舊敵人老蒙·尼可賴耶維奇·沙文、我們以前爲着有一點點施與而替他繼續工作了幾年的富農，現在還是比我們好得多。他把馬、牛和一架收割機借給農社，自己不工作，而他收到的報酬却比整個夏季在田裏辛苦工作的我們安格林一家七口子多幾倍。

明顯的，我們並不是僅有的不滿意於現狀之不公平的人。農民們都希望鄉村生活能有個調整，使得穀物一定歸於勞動者，而不讓閒人坐享其成。

有遠見的黨把鄉村轉向了集體農莊的生活道路。『農業合作社管理條例』是我們大家所久已期待的自由憲章。

我永不會忘記在教室外面廣場中開的那個村民會。我的父親，一個堅定而沉默的人，在那裏發表了他的第一次公開演說。我記得其中的每一句話。他說：『村友們，你們看見躺在那兒的一堆石頭嗎？它是一大堆……但是不懂用你們的手，甚至於用一隻腳就能使它散亂。』爲了證實他的理論，我父親踢開了一塊躺在堆頂上的大石頭，整堆就倒塌了。『你們明白了嗎？……石頭是粗糙不平、大小不齊的。但是假若你把它拿來築成一座牆。把每塊石頭和其他的相配，使一面突出部分和另一面的凹進部分投合起來沒有空隙留在外面。假如我們這樣做，我們就可以用這些粗糙的亂石築成一座五個人也推不倒的牆。村友們，我們過去就像那堆石頭一樣一直生活到現在，每個人都爲他自己……我們應該共同組織一個集體農莊……人與人結合起來，就像在建築一座牆的時候結合石頭一樣。那麼我們就會像一座堡壘一樣的堅強，沒有什麼東西能够勝過我們！』

父親講完了從教堂走廊上走下來。沒有人說一句話。會場上就像墓地一樣的靜默。通常，村裏開會是非常喧嚷的。如果是爲了建立一道籬笆要向每個人徵收一個戈比左右的捐款，大家一定會有一番吵鬧，……可是現在是影響他們全部生活的一件大事，爲他們展開一個新的世界，然而大家却鴉鵲無聲一言不發。……

斯大諾·拜雪弗的農民爲什麼沉默呢？

那些日子我們村裏的情況（整個國家裏許多鄉村料想也是一樣）是非常複雜的。中農動搖不定；他們在觀望，怕冒危險，深怕出了錯誤。富農賴夫脫羅夫、沙文、安東諾夫和潘尼奧托夫這幾家握有一切農具，他們是一個勢力。因此大部分村裏人，還是怕他們，假如不是尊敬他們的話。

但是我們不怕。

我們反對富農，他們全力地無情地憎恨新的制度。

貧農委員會的主席瓦西里·安格林常常接刊一些字條，寫着下面的詞句：

「主席，滾出這村子吧，不然我們要把你的五臟扯出來。」

但是共產黨員瓦西里並不「滾出去」；他強硬地繼續他的工作，雖然那些字條裏面的恐嚇並不是空話，富農當真殺害了村裏的積極分子。

在一九二九年的夏天，我的弟弟考斯第亞、我的妹妹妮阿里亞和我三個人正一起到鄰村諾弗·拜雪弗去出席列寧共產主義青年團的一個會議，有人從後面用一支來復式的手槍射擊我們。我們當時年紀都很輕（妮阿里亞只十四歲而我只十六歲）。

我永不會忘記我們怎樣赤腳在有刺的草地上跑，我們的心怎樣吓得亂跳，……但是在跑出了

危險地帶喘了一口氣以後，我們並不折回我們自己的家裏，而是繼續到諾弗·拜雪弗去參加會議。……

富農們把我年老的母親葉菲米亞打得要死，沒有別的理由，只因為她是我們的母親，共產黨員的母親。……

我們的家庭，以及許多和我們同樣的家庭，過去世代代替富農做工。我們充分明瞭無論如何不可能再和寄生蟲一道生活下去。他們阻礙着我們走到富裕生活的道路，理論爭辯、一般的限制、以及提高捐稅絕不能掃除他們。

黨又一次洞悉我們的需要並且指給我們擺脫困難的方法。通過斯大林的口，黨對我們說：對富農的限制現在正在過度到富農階級的消滅。……

這些話我的哥哥瓦西里常反覆申述——他是區黨委員會政治教育部的負責人，當伊凡·安格林、我們住宅區的黨組織書記，一天晚上匆匆忙忙跑到他那兒去的時候，伊凡把關於村會的壞消息、討論組織集體農莊問題的情形帶到了區黨委員會。

在我父親發言以後，富農潘尼奧托夫站起來說安格林一家人具有『妒忌的眼睛與強奪的手』，他們自己沒有任何東西，但他們却想要享有和富裕的農人一樣的地位。

當組織集體農莊的問題付表決的時候，僅僅七個貧農投贊成票，十二個富農投票反對，而絕

大多數（中農和少數胆怯的貧農）放棄投票，就好像說：「我們要等等看，爲什麼像一頭在門口的牡牛，一衝而進呢？」

在富農的影響之下，村會議決：本村集體耕種的農村應將安格林和其他投了贊成票的六家革除出社，讓他們自己去組織一個集體農莊。

這些「富農」於損害七家的實際利益之外，還要無禮地對他們侮辱。

「進行組織吧，」他們嘲笑地說。「五頭牛和一對山羊，七家人去吃小麥去吧。你們將有一個集體農莊。」

是的，我們的確很窮。我們的全部財產共計是五頭牛和兩隻山羊。但是會議的經過雖是這樣，瓦西里、區黨委員會政治教育部的首長，以黨的名義，在答復伊凡問他今後應該做些什麼的時候說：

「富農必須要清算。沒收他們的土地和農具拿來開始耕種。無論如何集體農莊必須組織起來，即令只有七家人加入。」

於是我們開辦了集體農莊——只有七家。

我自己參加了對富農的清算。那是激烈的階級鬥爭，極度緊張的日子，但只有在我們把富農打倒並把他們從土地上趕走以後，我們貧農才真正覺得立穩腳根。……

集體農莊的先鋒隊有很多的困難。工作困難地組織起來，每個人都必得終日勞作，……同時我們時刻感覺到全村對我們投來非難的眼色。我們每個人都知道，成功或失敗將決定那些在社會上不敢投票的中農與少數貧農究竟走那一條路。

這時候黨與政府出來幫助這第一批的集體農莊。尼可萊·安格林『紅色農業經濟學家』（這樣稱呼爲了使他和當時消極怠工的舊農業專家有所區別），被區黨委員會派到了集體農莊，他介紹了新的耕種方法。本區蘇維埃執行委員會給予農莊一筆貸款。最重要的是給予我們一部拖拉機。就是這件東西，使所有的動搖的人們馬上轉向集體農莊生活。

個別農民來到我們的田裏一站幾個鐘頭，在旁邊看伊凡·安格林，我們的第一個拖拉機手，用他的機器耕地。

後來，在管理委員會的每一次會議上，個別農民要求加入集體農莊的申請書逐漸增多起來。顯然，同樣的情形正在全國發展。……

我們把我們的集體農莊命名『列寧集體農莊』。

第一批集體農莊，……它們的名稱表示了希望與信心：『向共產主義前進』、『列寧的教訓』、『爲了文化』、『幸福生活』。……

那些日子裏我們的生活還不算快樂，我們普通人民，還不知道蘇維埃式的政府和它的集體農